

# 古典西学的“原初事实”

## ——亚里士多德《诗学》在当代中国的接受与现代性问题

杜心源·

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离不开西方借来的词汇、概念和分析框架，因此在学术史的反思工作中，对学科核心概念的翻译问题的考察不可或缺。提莫志克（Maria Tymoczko）认为，从词源学的角度看，“translation”是指将圣徒的尸骨残骸运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将一种文化中的精华、神圣之处运到另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在新环境中获得原有的崇拜，以此获得新生。<sup>1</sup>这种宗教化的认识对于强调翻译是一个充满文化冲突和权力关系的“政治”场域的后殖民批评家来无异于天方夜谭。但就希腊典籍在中国的流布情况而言，这一说法却有部分的合理性。在西方，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施特劳斯（Leo Strauss），都试图通过返回前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世界，达到对西方现代性及其危机更深刻的理解。而在中国学术界，无论希腊在西方文明中的源头地位，还是它与中国古典文明“自明”性的亲近感，都使其内在地被想象为陷于“现代性”泥沼中寻求出路的中国文化在路途上可能“遇到”的对象。可以看到，中国学界对希腊典籍中“关键词”的考察，并不完全是静态的梳理和描述，也往往是对那些后来成为普遍适用的抽象范畴——如理念、理性、自然、诗、模仿——的追问和论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翻译变成了复杂的工作，一方面，通过对基本范畴的“原初事实”的还原（刘小枫语），恢复被现代性切断的这些范畴背后的历史性和特殊性；另一方面，一旦论证了西方自己背离了自己的传统，现代的尺度就无法度量其自身的古典教诲，推而广之，也无法度量中国的古典教诲。因此，对古希腊文本的解读就不再被当做是中国现代思想的无关之物，而成为了一种在跨历史和跨语际中不断被建构的批判性叙事。

亚里士多德的《诗学》一向被视为西方美学的源头性教材，当代中国学界对它的翻译和研究庞杂丰富，无法尽述，在此准备以王士仪、叶秀山、刘小枫三位学人自1990年代以来的相关论著为中心，探讨其分别回到“原初事实”背后的动机，以图勾画出中国当代思想界的一个面相。

### 一、正名：对“创作学”的细读与误读

<sup>1</sup> 李欣：《翻译的换喻过程——Maria Tymoczko 教授论翻译》，《福建外语》2001年第4期。